

李大釗研究論文集



韩一德 王树棣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下

#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下

韩一德 王树棣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下**

韩一德 王树棣 编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1/32 20.875印张 518,000字 印数：1—3,6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46 定价：2.65元

# 目 录

-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许德珩(1)
- 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李葆华(10)
- 李大钊——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熊怀济(21)
- 李大钊同志与青年……………马模贞(29)
- 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  
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张静如(35)
- 试论李大钊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李世平(57)
- 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陷……………谭双泉(69)
-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叶桂生(93)
- 李大钊与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上海师大图书馆学系  
上海师大图书馆(116)
-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李大钊从急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戴鹿鸣(131)
- 解放思想的前驱 坚持真理的典范  
——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朱乔森(172)
- 五四前后李大钊同志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袁 谦、吴家林(184)
- 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  
李大钊同志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林家宥(200)
-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历史地位……………肖超然、沙健孙、梁 柱(222)

✓“离于众庶，则无英雄”

——李大钊同志是怎样看待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的 ……朱维真(249)

✓李大钊同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郭 烙(257)

✓五四前后李大钊哲学思想探讨 ……武 仁(270)

李大钊与吉野作造 ……吕万和(288)

✓试论李大钊同志人生观最显著的特点 ……陈 勇(292)

李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自传 ……黄 真、姚维斗(306)

关于李大钊的生年问题 ……黄 真、姚维斗、朱乔森(309)

李大钊同志被捕和就义纪实 ……李义彬(312)

✓李大钊同志与少年中国学会 ……韩凌轩(319)

李大钊与鲁迅 ……运 之、江 棣(327)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周子信(336)

论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韩一德、杨树升(351)

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的

早期组织 ……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371)

日新月异，与时俱进

——学习李大钊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 ……黄 真(381)

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 ……郝维民、其其格(397)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接触 ……吕明灼(421)

✓李大钊前期的民主思想 ……任建树(431)

李大钊对“好政府主义”的认识

——兼论其“平民主义”思想 ……吕明灼(443)

✓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初探 ……杜蒸民(459)

李大钊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大贡献 ……傅绍昌(476)

李大钊在开封 ……张 绛(490)

李大钊与冯玉祥 ……杨荣华(499)

✓李大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 ……韩 翼(503)

试论李大钊的反帝思想·····	朱建华、何荣棣(515)
○ 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	吕明灼(530)
○ 试论李大钊思想转变的主观条件·····	王永义(548)
○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韩一德(558)
、 李大钊与蔡元培·····	姚维斗、黄真(573)
、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历史观·····	曹木清(579)
、 李大钊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王世儒(602)
、 李大钊研究综述·····	韩一德、王树棣(619)
、 附：李大钊著作系年目录·····	(638)

#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 李大钊同志

许德珩

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二年了。每当想起这位革命先驱者光辉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形象，就不禁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而肃然起敬。反动的军阀虽然夺去了他的生命，可是他的革命气节和革命功业，却永远存留在我们心中，为我们所怀念。正如他在《青春》一文中所说：“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大钊同志号守常，河北乐亭人。他早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救国救民、“再造神州”的宏伟抱负和坚强决心。1913年，大钊同志留学日本，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他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了神州学会，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反袁的秘密活动。当时，大钊同志在章士钊在日本主编的以反袁为主旨的《甲寅》杂志上写文章，他每发表一篇文章我都要阅读。我对大钊同志那些热情洋溢的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敬佩，也很受教益。例如，1914年11月，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国情》一文，揭露了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驳斥了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有贺长雄鼓吹的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打击了那些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毁新复古”之徒，并告诉人们，不应当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存在幻想，不管它是

日本的或是欧美的：“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皆“非吾之纯确国情也”。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它发表于袁世凯称帝的一年以前，这就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阴谋，向我国人民发出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表现了大钊同志在政治上深湛的远见，和敢于向反动派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使我当时读之获益非浅。

大钊同志对于我国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是有信心的。他认为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广大的国土和四万万人民，只要人民觉醒，尝胆卧薪，发奋图强，就可以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前途将是无限光明的。1914年10月间，陈独秀以仇恨军阀的偏激之情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说我们国家极端黑暗腐败，根本没有可爱之处，甚至说什么与其如此，还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大钊同志从另一角度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侔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他对于少数青年因悲叹国事不振，外祸日亟而自杀的现象，更大不以为然。他说这些青年“爱国之诚，至于不顾生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则至可闵，而亦大足戒也”。他认为这些青年即使“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大钊同志希望我国人民都要自觉自勉，“勿灰心，勿短气”，发奋图强，勇往直前，突出地表现了大钊同志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折服。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大钊同志在日本时写的《青春》。这是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一篇宣言书，对前期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大钊同志在文章中鼓舞人心的警句，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激励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囿”，“涤



荡历史之积秽”，不要让“僵尸枯骨”把自己束缚起来；同时还要摒弃现代“虚伪之机械生活”，不受“黄金与权势”的支配，摆脱那营营扰扰的追求个人利禄之途。他认为，青年应当不断地以“青春”的精神来改造自我，“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篇文章，在当时对激发广大中国青年的革命进取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天我们读起来，它那种气势磅礴、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也仍然鼓舞人心。

总之，我在见到大钊同志以前，从他的文章中对他早已十分敬佩和神往了。

我和大钊同志认识是在1918年的春天。那时，大钊同志刚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素仰其人的我，能够得以亲聆教益，十分欣喜。在图书馆里，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北大图书馆原为藏书楼，设在马神庙的校址内，1918年10月才迁到刚刚建成的沙滩红楼新校址。大钊同志到职后，即着力于图书馆的整顿和扩充。著名藏书家江西九江李盛铎（木斋），是我的远门亲戚，他因我的关系把一部分藏书让给了北大图书馆。通过这件事，我和大钊同志就更加熟悉起来。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5月中旬，留日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鹤鸣）、王希天、阮湘、龚德柏来到北京和我们见面。大钊同志由于曾经留学日本关系，同他们很熟，特别是黄日葵同志归国后，先在北京大学旁听，后来考入了北大文预科英文学门。他与我极为相投，也与大钊同志熟悉，因此我们常到大钊同志的办公室聚谈。这时大钊同

志与已成为师友之间的交谊了，虽然从年龄上来讲他只大我一岁。

1916年以前，北京大学的校风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其中还有举人、秀才出身的学生。校内工友称呼他们为“老爷”，以后也是管他们叫“先生”。学生大部分住在公寓里，一般穿长袍马褂。学生除了少数死读书不问外事的人以外，当时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成为风气，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蔡元培先生于1916年冬到北大任校长。他来北大以后，发起成立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加入的称为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蔡校长以“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的腐败恶习。我与大钊同志先后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他在1918年6月还当选为进德会的纠察员。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一传到中国，大钊同志兴高采烈地欢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他在天安门前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接着又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光辉论文，热烈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

十月革命以后，大钊同志很快地成为我国思想界的领袖。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五四”前夕，北京学生成立了许多爱国的或讨论新思想的团体，有许多都和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大钊同志于1918年6月发起建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我和黄日葵同志都是经大钊同志介绍入会的。“少中”在大钊同志的倡导下，把“创造少年中国”作为一个理想提出来，当时还是发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五四前后，在许多有关社会活动的记载中，都能看到大钊同

志的名字。通过这些活动，他和周围群众有了密切联系，为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里要着重一提的，是大钊同志和我们“国民杂志社”的关系。国民杂志社成立于1918年10月20日，它是当时的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办的一个全国性的刊物。担任导师的大钊同志对杂志社的成立和刊物的出版进行过热心的帮助和指导，并为杂志撰写文章。

国民杂志社与新潮杂志社和国故月刊社是当时北京大学“鼎足而三”的社团。这三个社团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

《新潮》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但绝口不谈政治；与之对立的《国故》则专门反对白话文，鼓吹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而《国民》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国民杂志社对于五四运动的准备和发动是起过促进作用的。

1919年元旦，大钊同志在《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尖锐地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钊同志还鲜明地提出必须要“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中国和亚洲，然后与世界各民族结成“大联合”，从而“益进人类的幸福”。

与此同时，大钊同志和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鲁迅、高一涵、张申府等人都在这个周刊上投稿，对五四运动也起了积极作用。

五四前夕，北大虽然成立了若干社团，但是由于各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因而彼此之间隔阂甚深，甚至不相往来。偶一发

生问题就写出揭帖来贴在墙上（犹如今天的大字报那样），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张贴满墙。例如，《新潮》是傅斯年主编的，傅也是国文学门的，和我同班。胡适来北大后，我和傅等几个学生对他不满意，后来傅倒戈了，倒到胡适那边去了。1918年5月，傅斯年不赞成我们搞反日运动，竟跑到公府（即总统府）去告密，从此我们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适，并和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汪敬熙等组织了新潮杂志社。由于我们与傅斯年不对头，他们干的事我们就不干。傅斯年反对我们抗日，就不加入学生会。《新潮》提倡写白话文，我们《国民》的文章就用文言体裁，当然这与我们刊物是全国性的，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易接受有一定关系，但是也有与《新潮》搞对立的成分在内。到了五四以后，《国民》杂志就改为白话文。最令人折服的是，大钊同志把北大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点团结起来，组织在一起。如五四前，他动员新潮杂志社的罗家伦、康白情加入北大学生会，并说服我们允许他们参加。由于大钊同志的调解和促进，从而北大学生团结起来了，成为五四运动的一股主要力量。

团结在大钊同志周围的、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一部分爱国青年，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这时已经经常在一起活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咄咄逼人，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和严重；由于军阀政府腐败不堪，软弱无能，我们深感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斗争形势的需要了。我们在大钊同志的办公室里，越来越经常地讨论着一个问题——“直接行动”。“直接行动”，是大钊同志向我们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的，即不经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正规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斗争的实践也使我们深深感到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搞合法斗争是行不通的，1918年5月请愿运动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直接

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爱国青年中的核心分子，从而迅速传播到广大学生中去，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大风暴就是这样在酝酿着。而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夕的文章中，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地提了出来，这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到来前的一个信号。

五四前，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钊同志，通过学校、报刊、社团以及到各地的讲演等活动，联系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在为五四运动进行思想准备的同时，也在这个运动的组织准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中，大钊同志发表文章，正确地指出我们的仇敌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国的也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几个人。所以，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必须“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把这强盗世界推翻”。这种看法，对于五四运动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方向是大有益处的。

五四运动的斗争，致使北洋军阀政府恼羞成怒，进行反扑。在他们的逼迫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辞职出走。爱国青年的活动内容，又加上了挽留蔡校长复职，反对胡仁源来校（反动政府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这一强烈要求。大钊同志等北大教职员代表，于5月10日向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元培先生，更广泛地发动教职员，和广大学生采取同一步骤，把学生和教职员也团结在一起了。

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就号召我们：“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五四运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大钊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北京学联派我和黄日葵同志南下，同各界联络。于是“六三”以后，参加五四运动的就不只是知识分子了，而成为一个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妇女界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蓬勃进展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迫使反动军阀政府在6月7日释放了几千名因街头讲演

而被捕的学生，10日批准曹、章、陆“辞职”。

在此期间，北京城里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这是大钊同志和陈独秀等散发的。宣言中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废除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密约；指出卖国贼除了曹、章、陆之外，还有经手向日本借款和购买军火的徐树铮，镇压群众运动的段芝贵、王怀庆；并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和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的集会、言论自由权。最后宣告：政府若不“听从市民之希望”，劳工、学生、商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大钊同志带领两人去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同时，陈独秀、邓初（内务部佥事）、高一涵三人去新世界散发传单。就在这天，陈独秀被捕。大钊同志立即设法营救陈独秀，于当年9月出狱。及至阴历年底，陈独秀仍为警察厅所监视，呆不下去了，大钊同志挺身而出，化装成北方商人模样，驾上一辆骡车，让陈独秀坐在车里，顺利地护送陈独秀出京。大钊同志这种有勇有谋的革命精神，真令人钦佩。

我对陈独秀由于他的文人习气严重，私生活又不严肃，所以最初不大赞成他。五四以后，陈独秀赞成我们搞爱国运动，他本人因散发传单又被捕过，所以我对他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大钊同志热心帮助和接济同学的事迹，常为大家所称道。大钊同志经常把自己的月薪拿来帮助清苦同学。记得刘仁静同学因经济上拮据，一时交不了学费，大钊同志就出具证明，请学校准予缓交。这个证明现在仍然保存在北京大学的档案之中。

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赴法勤工俭学之前，大钊同志对五四运动给予的高度评价。1919年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举行纪念会，并欢送我和陈宝锜赴法勤工俭学（陈宝锜后来并未去法，而是到了英国）。是日到会者除社员七十余人外，尚有来宾李大钊、陈独秀、蓝公武及徐宝璜。大钊同志在会上发表演

说，大意谓：“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

但是，这次欢送会上同大钊同志聚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1927年4月底，大钊同志死难的噩耗传来，宛如青天霹雳，使我悲痛异常。当年欢送会一别，不料竟成永诀。

1927年5月，我正在武汉，大钊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在武汉的同志举行了沉痛的追悼会。我以北大校友的资格，在会上讲了话。诚如何香凝同志回忆的那样：当我们“在武汉开会，听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

1933年，党通过北大师生和他的生前友好，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这一公葬捐款的知名人士，有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我当时不在北平，回来后，特地到香山之下万安公墓去凭吊大钊同志，以表示我对大钊同志的深切怀念和爱戴。

陈毅同志在纪念大钊同志的文章里，对于大钊同志的一生概括了十六个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革命先驱，大节不辱”，我觉得十分中肯恰当。

大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我们永远学习的。

（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  
本书据作者的修订稿排印。）

# 回忆父亲李大钊的 一些革命活动

李葆华

我在父亲身边生活的岁月并不长。但是，父亲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的革命信念，炽烈的政治热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刻苦学习的精神，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及他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等事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鞭策、教育着我。

—

1918年7、8月间，我们全家离开渤海之滨的故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那时古老沉寂的北京突然笼罩着一派表面的喜庆气氛。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连日免费开放，招待市民。一天，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很有兴致地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中央公园，虽然已近黄昏，公园里仍然人山人海，拥挤非常。父亲带着我们来到按照克林德碑改建的“公理战胜”牌坊前，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地反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和卓识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父亲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前者是他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演稿，随后又在中央公园的庆祝大会上讲过一次。父亲在这两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曙光，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预言，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尽管我们当时不能真正理解父亲的见解，但他那种欢欣鼓舞的热烈情绪，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这些话一直为后人所传诵，鼓舞着人们为真理而斗争。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父亲的思想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父亲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世界，并以此为武器，奋起向旧世界宣战，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五四运动时期，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月刊的总编辑。这个学会在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设有分会。在父亲的努力下，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团体，是五四时代一个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父亲等人为争取确立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主义方向，多次同学会内的国家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后来，由于会员成份太复杂和时局的激烈变化，到1925年终于分化了。少年中国学会早期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很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许多早期的党员，如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高君宇、蔡和森、恽代英、张闻天、罗章龙、张申府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学会。